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3.03.021

清代巴县方志纂修论略*

高远

(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 安阳 455000)

摘要:学界迄今对重庆巴县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成果殊少,观点纷纭。职是之故,渝地巴县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探讨。论文就历史上巴县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简要说明,重点讨论了清代不同时空下巴县志之编纂概况及特点。清代留存下来的三部巴县志,以其独特的功用和价值,为我们搜罗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巴县;清代;方志;渝地

中图分类号:K297.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3)03-0128-06

古代重庆巴县地区本巴国地,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灭殷,封姬姓宗族于巴地,建立巴国。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前316)灭巴国置郡,治江州县,属巴郡,即巴县前身。南朝齐永明五年(487)析江州县地置垫江县。北周武成三年(561),省垫江、枳,以两县地置巴县。隋开皇初为渝州治,大业初为巴郡治。唐、北宋为渝州治。南宋淳熙末后为重庆府治。元为重庆路治。明、清为重庆府治。1913年废府留县。现为重庆市巴南区。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等,作为“一方之全史”,系统地记述了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历来受到各方人士之重视,故编修地方志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永久定制,也是国家实现主权管理的重要标志。古代重庆巴县地区自不例外,东汉便有《巴郡图经》的记载,直至近代,巴县志编纂仍赓续不断。因此,对历史上巴县方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研究,就具有了

重要意义。民国前,巴县地区完整留存下来的方志即是清代的[乾隆]巴县志、[同治]巴县志与[光绪]《巴县乡土志》。对它们进行研究,颇能探得古时渝地之各种相关情形之信息,在传承古老文明、丰富民族文化的今日,吾侪依然可凭之串联起巴山渝水之鲜活叙事与丰厚底蕴。

一、清前巴县志编纂概况

东汉的《巴郡图经》,应为见于文献记载最早的巴县方志。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但望为巴郡太守,曾上疏云:“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官,各有丞史……”^[1]卷16《请分巴郡疏》图经,顾名思义,就是以图绘为主,附加文字说明,是北宋之前志书的主要形式。《巴郡图经》应为我最早方志图经,今佚,清人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五存目。由记载可知,当时巴郡范围甚大,辖境相当今四川

* [收稿日期]2013-01-17

[基金项目]重庆市2010年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三峡历史文献整理研究”(2010TBWT04)

[作者简介]高远(1981—),男,河南漯河人;历史学博士,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学史、历史文献学研究。

旺苍、西充及重庆永川、綦江以东地区。

三国时蜀人谯周撰有《三巴记》。向楚云：“谯周《三巴记》则著于隋志。《常志·士女目录》陈弘下引《巴纪》，疑即谯周《三巴记》。《太平御览·人事部·礼仪部》皆引《三巴记》。又《巴蜀异物志》引见《史记集解·周勃世家》，又见《屈贾传》《索隐》，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涪陵多大龟云云。疑即《巴蜀异物志》与《三巴记》同为谯周撰。”^{[2]卷23}三巴，即巴郡、巴东郡、巴西郡，其地在今四川省、重庆市。“是书为四川、重庆两地有佚文可辑的最早方志。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还引用，约亡佚于元代末年。”^{[3]52}今人刘纬毅先生曾据各书辑录出散见内容十则。^{[4]38-39}

晋有常璩《华阳国志》之《巴志》。列总叙、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宕渠郡六节，专门记录重庆地区的地理历史、物产民情等，是现今能保存下来的记载四川、重庆及周围地域形势等最早的一部志。其内容、体例及所志范围与今天所说的“地方志”（即省、府、州、厅、县等志书）不尽相同，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这也是导致后世目录学家分类此书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的原因。在其同代，又有袁休明的《巴蜀志》，见于《隋书·经籍志》与清人文廷式的《补晋书艺文志》。

晋以后方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唐宋元时期曾编有《渝州图经》《渝州旧图经》《祥符渝州图经》《渝州志》《重庆图经》《重庆郡志》。^{[5]674-675}向楚云：“（重庆）郡县方志，自赵宋巴有文献为最早。”所谓“赵宋巴有文献”，或即张国淦先生所考宋《经》、宋《志》。唐宋元时期，有关重庆地区的方志纂修状况不佳，基本上没有留存下来，故而有学者指出：“虽云唐、宋、元各代均有编纂（撰）者，然而仅见于它书记载其名，或保存其序跋，至今并未见完整的专书流传。”^{[6]1-2}

关于《渝州志》，清王尔鉴修《巴县志》时即认为宋代方志，张国淦考证亦为宋代方志，近著《宋朝方志考》亦列入宋代方志之列，“当纂于仁宗至哲宗朝间”^{[7]477}。经笔者考证，应为明代方志。《蜀中广记》有三处确言引《渝州志》之文字：“《渝州志》云，黔涪徼外有西南夷部……”^{[8]卷38}

“《渝州志》云，宋景定中，蛮酋大虫马什用同向士璧率师大败元兵，继平九溪洞夷，授镇国上将军，领铜牌铁印。”^{[8]卷39}“及观《渝州志》载《谟烈辑遗》云，洪武四年，明升以全蜀降……”^{[8]卷59}尤其是“及观《渝州志》载《谟烈辑遗》云”，按《谟烈辑遗》，即《国朝谟烈辑遗》二十卷，明太祖第十子朱檀第四代后裔朱某辑，有嘉靖三十二年（1553）刻本。《谟烈辑遗》成书时代在曹学佺任四川按察使之前，《蜀中广记》乃曹氏任四川按察使时所撰。又向楚云：“《蜀中广记》……所引尤多晚明书。”^{[2]卷23}既然《谟烈辑遗》被收入《渝州志》中，可见《渝州志》是明代方志无疑。王尔鉴谓“宋有《渝州志》，明显误也。

明代巴县地区方志之撰修，清同治巴县志《凡例》有云：“明有《重庆府志》《巴县志》，经兵燹后，板片荡然。”此“明有”《巴县志》，未详所据。现存成化《重庆府志》（残本）和万历《重庆府志》（残本）。蓝勇先生云：“现存最早的《重庆府志》当属成化年间江朝宗所修撰的《重庆郡志》，”“必须指出的是，以前国家图书馆载录此志时都称为成化的《重庆府志》，而在成化《重庆府志》中的一些子目中，如在土产下多次称见《府志》，显然江朝宗编的志书可能本身并不称府志，应按万历《重庆府志》称为《重庆郡志》。”^[9]江朝宗所撰《重庆郡志》，“鼎革后亦烬灭无遗”^{[2]卷23}。按江朝宗（1425—1503），字东之，巴县人，有《紫轩集》《蜀中人物记》等。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四有“《重庆府图志》二册”“《重庆郡志》一册”“《重庆郡志》七册”“《重庆府并属县志》四册”。杨士奇乃明初人，《文渊阁书目》编于宣德四年（1429），在成化《重庆府志》、万历《重庆府志》成书之前，然不详《重庆府图志》等编纂时间。《蜀中广记》多有“《重庆志》云”，然不详是成化或万历本。又清康熙间人陆廷灿《续茶经》曾引《重庆府志》：“《重庆府志》，涪江青口石为茶磨，极佳。”此所引《重庆府志》当是明代方志，亦不详是成化或万历本。

今成化《重庆郡志》，有明代木刻本，明末已残，仅存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卷，藏于国家图书馆。郭礼淮说“重庆市志总编室有复印

本”^[10],笔者遍访未得。今万历《重庆府志》,历次修成的府志中规模最大者,计八十六卷,但此志修成于明末,刊本稀少,旋即遇上明末战火,至清时存世量极小。残本藏于上海图书馆,缺卷四至二十五,余者装为二十三册。沈津撰有《明万历刻本〈重庆府志〉》可供参考。^{[11]41-44}四川省图书馆原有其胶卷,惜佚。

至清代乾嘉年间,巴蜀地区明代县志已“寥若晨星”,有的地区甚至散佚殆尽。尽管如此,渝地大多数佚志的序、跋,在清志、民国志的“前志原委”“艺文志”“旧序”“序录”中可以找到或有著录,这就为我们研究渝地散佚志书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清前渝地方志散佚严重,究其原因,不外乎自然和人为造成的,尤其是明末战乱使渝地地方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如熊家彦《巴县志》叙中所说:“蜀东渝州附郭巴邑,居三巴之中,为文献名区,前志遭胜代兵燹后,荡然无存。”道光时重庆府知府王梦庚《重修重庆府志叙》亦称:“有明江学士朝宗所撰《重庆郡志》,鼎革之后,亦残蚀不全,心怅然久之。”另外,“新志甫成,旧志遂废。”后人修志每想胜过前人,对旧志多有訾议,这样相率厌弃旧志。如此,旧志久不为人所用,而逐渐失传。

二、清代巴县志纂修述略

由上所论,巴县建置悠久,早在东汉便有志书纂修,并非有的学者径称“巴县志始修于清”^[12]。清代是中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就四川而言,张献忠势力被剿灭后,地方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序相对安定,方志的编纂也再度繁荣起来。清代巴县共纂有三部方志:[乾隆]巴县志、[同治]巴县志、[光绪]《巴县乡土志》。民国以后,四川各地共编修志书达164部,其中向楚等纂修的《巴县志》便是一部佳著。

向楚曾云:“乾隆初,罗醇仁著《中巴纪闻》,王《志》取资焉。”^{[2]卷23}按罗醇仁,字济英,合川人,少入巴县学籍,乾隆十年(1745)进士,尝两掌东川书院,造就多士。很显然,在王尔鉴纂《巴县志》之前,有罗醇仁《中巴纪闻》存世,今佚。

乾隆十六年(1751),王尔鉴知巴县,始纂《巴县志》。“今《志》始辑于乾隆十六年十月,讫于乾

隆二十五年十有一月。”^{[13]卷首}方志编纂用了十年时间,后刊于乾隆二十六年。王尔鉴云:“余修是《志》,取材《通志》十之一。考之邑人罗醇仁《中巴纪闻》十之三。搜之笥篋、得之采访十之六。”^{[13]卷首}王氏取材之《通志》,指雍正《四川通志》。乾隆《巴县志》,周开丰谓之《巴县新志》,又习称“王志”,共17卷,卷首序、姓氏、凡例、城图、輿图,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赋役,卷四学校,卷五兵制,卷六职官,卷七选举,卷八名宦,卷九人物,卷十风土,卷十一至卷十六艺文,卷十七艺文补遗。该志资料翔实,仿史家之笔,是研究重庆地域史的重要史料。熊家彦云:“王熊峰(尔鉴)……积十稔之功……虽于体例未尽讲求,而创始之功,亦不可没。”^{[14]卷首}乾隆《巴县志》是开创,是同治、民国《巴县志》之重要参考材料,但能否称为“现存的关于今重庆地方的第一部志书”^{[15]1335},就值得商榷了。

百年后,同治五年(1866),霍为棻权知巴县。锡珮云:“岁在丁卯(同治六年),余……备兵川东之二年,邑人士以修志……霍苑史(为棻)……慨然念前徽云远,遗文轶事,搜辑患难,有志于兴庆举坠。”^{[14]卷首}锡珮,字韦卿,蒙古镶黄旗荫生,同治三年任重庆府知府。霍为棻云:“岁丙寅(同治五年),余莅斯土……适熊仲山观察自滇来渝,延请纂辑,六阅月而(《巴县志》)书成。”^{[14]卷首}熊仲山,即熊家彦,字仲山,湖北孝感人,奏调办理云南军务候选道。“(熊家彦)先生为楚中名宿,穿穴全史,负一代著作之才,乃采掇旧事,为之广续,详考古典,补其阙遗,本末粲然,无不综贯。”^{[14]卷首}该志修成于同治六年,同年夏刊刻。同治《志》是在乾隆《志》基础上编纂而成,如熊家彦序云:“爰取原志(乾隆《志》),斟酌分合去取,约其前纲而详其目……较原志为简。”同治《志》完成后,县人龚瑛因其“较原志为简”,故“遂别属草,直续王《志》”。向楚云:“熊氏……仅就王《志》分合去取,约其纲而详其目,成书太略,刻成旋废,盖为县人龚瑛辈所诃,遂别属草,直续王《志》,曰《同治未刊稿》,存保甲局,岁久稿佚。”^{[2]卷23}龚瑛,巴县人,道光二十年进士。同治《巴县志》因失之过简,刻成旋废,另拟草本,习称同治未刊稿。该志

计4卷,其中所附《杂记》有较大价值。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仲冬,巴县劝学所编印了《巴县乡土志》,内容与前纂方志有很大不同。乡土志编纂肇始于晚清,是在清政府生存危亡的背景下实行的一次教学改革,具体内容在传统地方志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多突出实业状况、科技发展、社会变革等,以激发学生的爱乡爱国思想为要义。《巴县乡土志》的编纂适逢晚清社会变革,带有了近代气息。该志以地理以前为上卷,其下为下卷,共有历史、地理、商务三部分。并附有乡里大势及本境山脉大势两图。图系木刻,而文字为铅印。历史部分包括建置、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录、户口录、氏族录、宗教录等,地理部分包括方位、里数、界址、区划、山脉、水道、钱粮杂税、物产等,商务部分主要记载本境物产制造之行銷本境及出境销者,以及他境货物运之本境销者。傅振伦先生曾撰有《〈巴县乡土志〉提要》一文,对此作了简要概括:“案本书多摘自乾隆《巴县志》,如政绩录清代名宦董佩籍、向廷赓、李九霞、王志武等之不见乾隆志者,今亦未载。又案《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渝州巴县条载:‘周明帝武成三年改垫江为巴县,后遂不改’,但今书载‘巴县后周武成二年置’,‘二年’应作‘三年’,可能是排印之误。”^{[16]520}

自同治六年《巴县志》后,又过了70年,民国《巴县志》完成。据朱之洪叙民国《巴县志》云,1913年,朱之洪与吴恩鸿等创议续修《巴县志》,因讨袁军败,罢议。1922年,巴县议会决议重修《巴县志》。1924年,县长杨裕昆成立重修《巴县志》筹备处。1926年,县长郑东琴延请《巴县志》分纂。然志事未果。1936年向楚为总纂,两年时间,《巴县志》稿成。民国二十八年(1939)刊印。民国《巴县志》向楚《叙录》云:“王《志》原分十一类,事属草创,今之所纂,凡沿前目,求详订误,增补实多,旧所无者如交通、农工、商业、军警、交涉、自治、物产、市政、蜀军始末诸大端,而事纪别为专篇,改造补苴,虽因实创,不敢言备,比之王、熊二家,盖有讨论修饰之功矣。”

乾隆、同治、民国《巴县志》目录分类共同者有疆域、建置、职官、赋役、学校、寺观、关隘、风俗、

人物、艺文(包括金石)。乾隆《志》有释老,民国《志》有宗教,同治《志》无,为“寺附”。同治《巴县志》“凡例”云:“邑中之山……寺观带叙其中,不得列专门张崇尚象教之焰。”象教,指佛教。民国《巴县志》有公债、图书馆、报馆、工业、商业、铁路、轮船、邮政、电报、电话、航空、军警、教案、红十字会、自来水、电力厂、公园等,此为近代社会所有,视之乾隆、同治两《志》,乃社会进步也。而民国《志》又有“事纪”“方言”,是乾隆、同治两《志》所无也。

概而言之,清代巴县地区三部方志的编纂处于不同的社会时期,烙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进而表征出不同的体例类目与记载内容。清代巴县方志贯通古今、横陈百科、包罗万象,这一全面、详尽的地情、国情书,以其文献的独特功用和价值,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清代巴县志价值探论

古代学者在编纂方志的同时,也在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尤其是在清代,一大批学术造诣深、文字修养高的学者参与到修志中来,并以修志为“著述大事”,“对志书的体例、编纂方法等作了多方探究,大大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水平和存史价值,推动方志在清代迅速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并作为一门学问正式诞生。”^{[3]259}如洪亮吉在《泾县志·序》指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李兆洛在《凤台县志·序》中说:“凡居百里之地,其山川形势,人民谣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更是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17]128},在《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中言:“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矩准绳,不可忽也。”^{[17]127}

清代巴县志编纂适逢这样一个学术环境,故志书纂修中处处印证着清代方志理论的观点。如乾隆《巴县志》“凡例”云:“善善欲长,恶恶欲短,忠厚之道也。但有其人身列名教中,却大羞名教,不得不暴其罪而除之,又有其人与文素有声望,而瑕瑜各不相掩,则于选举、人物两册内分别书之,俾后人知所向背,仿史家直笔也。”由此可见,“仿史家直笔”,乃王尔鉴臧否人物志之准则。如《志·

选举》按云：“泰昌、天启时，御史贾继春创为安选侍、保皇妹之说，以迎合客魏，与杨、左诸君子讎讟不休，遂起大狱。崇祯末，童思圣令谷城，与猷贼有识，罢归，贼寇重庆，思圣迎贼梁山，喜甚，旋杀之，家口无一存者。二人最为名教羞，《选举》并削之而暴其罪。若苟之祥、任元极之纵欲，败检黷、货营私；贾元勋之居官贪酷，居乡横暴，士林并宜为戒。”所列贾继春、童思圣、苟之祥、任元极、贾元勋诸人，“身列名教中，却大羞名教，不得不暴其罪而除之。”贾继春与左光斗事，皆见《明史》，（崇祯）帝曰：“惟反覆，故为真小人。”童思圣，巴县人，崇祯元年进士，其事迹不见史载，由乾隆《志》知其“迎贼梁山”之行踪。据雍正《四川通志》、民国《巴县志》，苟之祥，巴县人，天启元年举人，五年进士。任元极，巴县人，万历四十六年举人，崇祯七年进士。乾隆、同治、民国《巴县志》皆无传，今据乾隆《志》知二人“纵欲，败检黷、货营私”。贾元勋，巴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民国《巴县志》据《安陆府志》崇祯七年知承天府，今据乾隆《志》，知其“居官贪酷，居乡横暴”。

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唐刘知幾《史通》曾提出著史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章学诚将其加以改造提出修志人员也应具备“识”“明”“公”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乾隆《巴县志》将“仿史家直笔”作为纂修准则，就是一种“识”，必然要求纂修者秉公心、不溢美、不隐恶，进而使方志发挥出资治、教化与存史的功能。又如同治《巴县志》“凡例”云：“志，史家之一门也。传信不传疑，与史同；载美不载恶，与史异。同异之间，不可不辨。”很明显，同治《巴县志》已将方志与地理书的性质区别开来，明确指出“志属史体”，并且辨析了方志与史体之异同。

清代巴县志编纂不仅在理论上体现着时代的特色，而且内容记载上更加充实，实用价值和史料价值大大提升。如清代三部巴县志关于人口资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巴县人口数量的变化及社会变迁。明末，四川战乱频繁，人口剧减，据乾隆《巴县志》载：“明原额……人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六丁。”^{[13]卷三}清顺治三年（1646），诏天下编审人丁，并以原报册为定，惟年老、残疾、逃亡、故绝者悉行豁免。康熙十年（1671），定各省平民

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康熙五十一年（1712）上谕：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钱粮，只将实数造报。廷议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常额，以后为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由此巴县人口有增，据民国《巴县志》：“嘉庆元年以后，报部户口则为七万五千七百四十三户，男女二十一万八千七十九丁口。户与口分晰，各计其数，均较乾隆王《志》为多。且丁口孳生之数，超至二十倍以上。”^{[18]卷4}清末特设专部执掌民政，各直省以巡警道专司户口之事，明令分乡分区自行调查，先户后丁，限年确报。巴县于县属设课统计。据《巴县乡土志》载，光绪末年调查，“县域城厢37 090户，112 000余人；三里87场107保共148 863户，644 577人，其中男364 487人，女280 090人。”^{[19]641}清代巴县方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与纂修者的社会层次和文化层次较高分不开的，如乾隆《巴县志》，由知县王尔鉴主修，贡生王世沿代笔，举人周开丰负责资料采集及校订诸事，初编就绪后，由前四川奉节知县姜会照润色，历时十年方完成。

众所周知，地方志的区域性记录特征应该说是方志最初的面貌，方志中数量最多的也就是对一个州府、县治、乡村中物产、人文、民风民俗的记载，尤其着力表现在生活中代代相传的民俗、节庆，这些已经成为凝结中华民俗情感的纽带。清代巴县志编纂中有诸多农业种植、农作物及土特产、民风风俗的史料，如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志》中的“习俗、节序、物产”，同治《巴县志》卷一《疆域志》中的“风俗、岁时、物产”等。历史最忌讳的就是没有细节，那么这细节就依靠地方志补充。通过阅读清代《巴县志》，我们可知体验古代渝地老百姓的服饰、饮食、居住、出行等变化，可以感受古代渝地节庆文化的别致与风情。我们对清代巴县方志中风情景物的追溯再现，对传统文化脉络的梳理展示，折射出了现代社会中我们对祖先留下的文化财富应该采取的态度。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是一方人的物质家园，一本本志书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

光绪《巴县乡土志》，诞生于晚清民国时期编纂乡土志教材的热潮中，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开启了巴县近现代乡土教学的新模式。其所记多为乡土之事、多是耳所习闻与目所常见，更重要的是黜

华崇实、按切时事、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如《历史》中有“宗教录”,记巴县境内天主、耶稣等西教源流及回教户口;《地理》中有“钱粮杂税”,项目有正粮、津贴、捐输、铁路租捐、肉厘、酒捐、洋关、出口货物及进口补完半税、老新厘金、税契。以上所列明显具有近代特色,是巴县方志编纂中的一次重大变化。所述文字又结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强调教学的趣味性,虽是街谈巷论,而一山一水,一木一石,都是儿童嬉戏的对象,一经指点,能启迪知识。此类乡土志教材的编纂,重在讲求实学,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和竞争意识,进而达到培养学生爱乡爱国思想的目的。我们今天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同时,应借鉴乡土志中的教育思想,使教学与现实紧密结合。

纵观巴县地区方志编纂源流,可谓源远流长,但发展不平衡,其发展高峰和主要成果集中于清代。清代巴县编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并受当时思想学术的影响,学界研究时应将其置于时代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与其他文化层面相互渗透的过程和双向会通的动因,从而加深人们对清代巴县方志研究价值的认识。总之,包括清代巴县志在内的中国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载体,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仍将继续衔接千年过往历史,记录当下社会风流,为推进中国史研究发挥极大作用。

(本文写作得到胡昌健先生的指导与惠赐资料,特表谢忱)

[参考文献]

[1] 梅鼎祚. 东汉文纪[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1397

册).

[2] 向楚. (民国)巴县志[M]. 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3] 刘纬毅. 中国方志史[M]. 山西:三晋出版社,2010.

[4] 刘纬毅. 汉唐方志辑佚[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5] 张国淦. 中国古方志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6] 何金文. 四川方志考[M]. 吉林: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5.

[7] 顾宏义. 宋朝方志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8] 曹学佺. 蜀中广记[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9] 蓝勇. 成化《重庆郡志》和万历《重庆府志》考[J]. 中国地方志,2010(2).

[10] 郭礼淮. 简谈明清编修的三部《重庆府志》[J]. 重庆地方志,1988(4).

[11] 沈津. 书城挹翠录[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

[12] 张划. 新编《巴县志》与民国向楚《巴县志》的比较[J]. 中国地方志,1998(3).

[13] 王尔鉴. (乾隆)巴县志[M]. 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4] 霍为霖. (同治)巴县志[M]. 清同治六年刻本.

[15] 陈桥驿. 中国都城辞典[Z].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

[16] 傅振伦. 傅振伦方志论著选[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17] 章学诚. 章学诚遗书[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8] 向楚. (民国)巴县志[M]. 民国二十八年刻本.

[19] 巴县志编纂委员会. 巴县志[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朱德东)

Narrative Comments on Compiled Local Records of Ba County at the Qing Dynasty

GAO Y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an Anyang 455000, China)

Abstract: So far, there are few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sults on compiled Local Records of Ba County in academic circle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it, as a result, the source and course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revision of Local Records of Ba County of Chongqing are worth discussing. This paper briefly illustrate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ing for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Records of Ba County in history and emphatically discusses the outline and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Local Records of Ba County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at the Qing Dynasty. Three Local Records of Ba County left behind from the Qing Dynasty, with their unique function and value, provide reference for us to search local culture information and to develop current culture.

Key words: Ba County; the Qing Dynasty; Local Records; the area of Chongqing